

Carol Benedict, *Bubonic Plagu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xx + 256 pp.

蔣竹山*

鼠疫是一種藉由齧齒類動物傳至人類身上的傳染病。其感染的類型有三種。(一)腺鼠疫 (bubonic plague) 傳染是經由跳蚤咬傷後導致淋巴結腫大和組織腫脹。(二)肺鼠疫 (pneumonic plague) 是被感染者的肺部受侵害，經由噴嚏或咳嗽的飛沫而傳染。(三)敗血症鼠疫 (septicaemic plague) 是經由血液而感染。人類歷史上有三次腺鼠疫的大流行，第一次是六世紀中葉東羅馬帝國的「查士丁尼瘟疫」，其次是十四世紀歐洲的黑死病，最後是一八九四年於香港爆發，後透過船舶貿易傳至西方的腺鼠疫¹。

其實從一八〇〇年以來，腺鼠疫即一再於中國發生。在此之前，尤其是十四至十七世紀，未經證明的流行病曾造成人口的激滅。由於十四世紀中國的疾疫流行與西方黑死病同時發生，有些歷史學家就推測這兩者之間有某種關連。然而，中國的現有的資料並無證據可支持這項假定，中國腺鼠疫的神祕面紗一直要到十九世紀末才被揭開。腺鼠疫於十九世紀末出現在中國南方，並於一八九四年在香港到達高峰，當時中國政府與殖民地醫學對此事的處置態度明顯不同，甚至衝

* 清華大學歷史所博士班

¹Ann G. Carmichael, "Bubonic Plague," in Kenneth F. Kiple, ed., *The Cambridge World History of Human Diseas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628-631.

突不斷，直到一九一一年滿州爆發了第二次鼠疫，中國政府才開始接受西方醫學的公共衛生及防疫政策作為現代化計畫中的一環²。

由於鼠疫問題的特殊性，從二十世紀初期以來即不乏調查中國鼠疫的著作 (Simpson 1905、Wong and Wu 1935、Wu 1936、Hirst 1953)，但這些著作大多是醫政主事者的政策執行報告，少有從醫學與社會的關係去探討疾病的流行史。而 Carol Benedict 正好補足傳統研究的缺憾，此書可說是西方史學界討論十九世紀末中國疾病史的第一部專書。

本書是由 Benedict 一九九二年史丹佛大學的博士論文改寫而成，此書出版前，作者曾在期刊上發表過相關論文³。全書共 256 頁，除導論、結論外，共分六章以及兩個附錄：「附錄（一）香港 (1894-1923) 及台灣 (1897-1917) 鼠疫的感染數及死亡數」；「附錄（二）香港 (1893-1907) 及台灣 (1897-1906) 死亡原因的比較」。基本上，本書可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份主要採取一個區域系統的方法去建立鼠疫在區域間的傳佈模式。第二部份則探討十九世紀末中國政府及社會對鼠疫的反應。以下則先就各章作重點介紹，然後再針對幾項議題作深入討論。

「導論」：首先，作者說明以往學者對中國鼠疫問題研究的不足之處，強調本書從歷史、地理及傳染病學的角度來觀察晚清中國鼠疫

²Carney T. Fisher (費克光)，〈中國歷史上的鼠疫〉，收於劉翠溶、伊懋可主編，《積漸所至：中國環境史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1995)，頁 674-675。

³Carol Benedict, "Bubonic Plagu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Ph.D. diss., Stanford University, 1992, 本書和作者博士論文無論在章節及內容上都有若干差異，尤其第二部份；相關論文見 Carol Benedict, "Bubonic Plagu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in *Modern China* 14.2 (1988): 107-155; Carol Benedict, "Policing The Sick: Plague and The Origins of State Medicin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4.2 (1993): 60-77.

的爆發原因及影響。作者關懷的重點在鼠疫如何出現於雲南，它如何從西南地區傳至東南沿海各省，以及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中國的社會、醫學及宗教反應。其次，作者從現代的傳染病學來解釋鼠疫的傳染途徑及病癥，以及介紹當代中國的鼠疫生態學（三大疫區：滿州平原、雲南西部峽谷、東南沿海）。最後，分析中國文獻中對鼠疫的疾病分類及定義，作者發現「鼠疫」一詞要到十九世紀末才出現。對於部份研究者（李濤、范行準）將明清之際所發生的大疫解釋為與鼠疫有關的說法，作者則持懷疑態度。作者於文末則說明 Skinner 的區域理論的核心／邊緣概念有助於分析傳染病的傳佈過程；以及介紹本書所使用的一些重要史料：包括方志、十九世紀外國學者的觀察記錄、海關醫學報告、以及大陸當代的鼠疫調查報告。

第一章：「中國西南地區鼠疫的源起 (1772-1898)」。作者認為鼠疫早在十八世紀末以前既已在雲南西部出現，但其傳染範圍直至十九世紀初之前，都未能超出雲南邊境。到了十九世紀中葉，隨著雲南地區人口數量的增加及商業的擴張不僅導致了當地鼠疫的爆發；亦因當地與東南沿海地區間的長距離貿易量增加而將鼠疫病源擴散至雲南以外地區。而一八五六至一八七三年的「回亂」更加快了雲南境內鼠疫透過嶺南地區傳至東南沿海的速度。

第二章：「內陸地區鼠疫的傳佈 (1860-1894)」。本章則進一步探討鼠疫如何在十九世紀中葉由雲貴地區傳至嶺南地區，作者發現這兩地之間的鴉片貿易是最主要的媒介。儘管西河流域 (West River System) 時有盜匪出沒，但一八四〇年代時它仍位居當時鴉片貿易的主要管道。隨著一八五〇年代太平天國之亂的爆發，西河流域作為雲南與廣東兩地交通樞紐的功能徹底喪失。這種外在的原因促使行商另尋管道輸送鴉片，此時雷州半島西北方的「北海」自然而然地取代了西河流域，成為雲南至嶺南鴉片貿易的主要中心。隨著這條金三角路線的形

成，使雲南鼠疫得以快速傳至東南沿海的主要貿易城市。從一八六〇年以來，北海及雷州半島就持續成爲廣東東部及中部鼠疫的病源區，而雷州半島的疫情一直要到一九五二年才被完全控制。

第三章：「東南沿海地區鼠疫的空間傳佈 (1884-1949)」。歷來醫學地理學者慣用三種「疾病傳染」理論來描述傳染病的空間傳佈過程：(1) 變位傳染 (relocation diffusion)，(2) 都市層級傳染 (urban-hierarchical)，(3) 接觸 (或擴張) 傳染 (contact or expansion diffusion)。但究竟何種說法較適合說明中國近代鼠疫的傳染現象，則有待進一步的分析。本章基本的目的即在證明並沒有所謂的單一「都市」或「鄉村」的鼠疫傳染模式，而是複雜及多重的傳染過程。作者首先點出歷來西方學界，無論是城市理論派 (Slack、Biraben) 或鄉村理論派 (Eckert、Benedictow)，他們對鼠疫傳佈模式解釋的缺點是過於堅持單一說法，而不知融合。其次，作者舉出二十世紀中葉兩位傳染病學家 R. Pollitzer、William Landauer 對一九三〇年代的福建與海南島的研究特色，認爲二者的調查可用「都市層級傳染」及「接觸傳染」兩種理論涵蓋，但仍有必要再進一步對十九世紀末作研究。因此，作者透過 G. William Skinner 的區域城市貿易體系理論 (regional-city trading systems) 來比較廈門、福州、平陽三地。她發現大多數鼠疫發生在區域城市的貿易體系中，例如廈門及福州即因爲有海運而不受地形的限制，使得鼠疫得以跨越障礙，沿著海岸傳播。透過三地比較，Benedict 認爲混合的「都市層級傳染」及「接觸傳染」模式應在區域核心城市出現，而「接觸傳染」模式只單獨出現在區域邊緣。「都市層級傳染」及「接觸傳染」的理論或許可以解釋爲何廈門及福州比邊緣的平陽更有密集及經常性的鼠疫。

第四章：「十九世紀中國對鼠疫的醫學、宗教和行政反應」。作者首先探討十九世紀末中醫對鼠疫的看法。當時醫界對鼠疫問題的療

法明顯分爲兩派：傷寒與溫病學派。傷寒派以一九〇九年出版《鼠疫非疫一六經條辯》的黃仲賢爲主，他主張鼠疫並非厲氣導致的瘟疫，而是「六淫」中的邪氣所致，但他的說法明顯不如溫病學派的普遍。溫病學派則以吳宗宣（《鼠疫彙編》，1895）、鄭肖巖（《鼠疫約編》，1901）爲主，他們強調改善家居衛生條件如同注意個人生理一樣重要。Benedict 認爲這樣的說法可能是受到西方十九世紀學說的影響，但和西方不同的是，溫病學派並沒有傳染病 (contagion) 的觀念。作者在此並未清楚交代西方當時對鼠疫的主流看法究竟是什麼？中國醫家如何在受西方「環境說」的影響下卻不知「傳染說」？其次，作者從宗教層面探討有關通俗信仰對瘟疫的緣起看法（五瘟使者、疫鬼、瘟神）及社區對鼠疫的反應（清醮、找尋淨水、吃素、戒淫）。這部份大多沿襲宗教史家劉枝萬及 Paul Katz 對瘟神的研究，並無獨特之處⁴。最後，作者則談到官方對鼠疫的反應。相較於地方將水旱災情況回報中央的密集度，有關疾疫的報告就少了許多。十九世紀末中國官方最常見的處置措施就是施藥至災區（施藥局）。除了天花對滿族皇室造成威脅時的避痘措施，清政府從未曾透過隔離措施來防治瘟疫。但這並不表示官方對疾疫漠不關心，他們通常會設置慈善機構，祈禱瘟神，及參與社區儀式及賽會活動。

第五章：「市民行動主義、殖民醫學及一八九四年廣東與香港的鼠疫」。本章作者舉了廣東、香港兩個不同的例子來比較中國本土及殖民地政府對鼠疫的處置態度及反應。在一八九四年的廣東，主導解決鼠疫問題的是地方菁英而非官方，而「善堂」成爲此時處理鼠疫患

⁴劉枝萬，《臺灣民間信仰論集》（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2）；Paul R. Katz, *Demon Hordes and Burning Boats: The Cult of Marshal Wen in Late Imperial Chekiang*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5).

者的主要機構(收容患者、施藥)，此外亦有些慈善人士會捐建診所或出錢鼓勵民眾捕鼠。同樣的鼠疫問題在英國統治下的香港則有截然不同的做法，卻亦因此引起香港市民的反彈。當一八九八年 Paul Simond 公佈鼠蚤可能是鼠疫傳染的媒介時，許多西方學者仍然拒絕接受這樣的說法，他們依然認為鼠疫是一種污穢的傳染疾病。受此影響的香港政府的防疫政策則是拘捕及控制中國居民，以及拆毀居屋及個人所有物。當時被懷疑受感染者則被拘留在醫院船「Hygeia」上，港島則受到封鎖。對於這些嚴厲的隔離措施，東華醫院董事會則召開會議建議商家向英政府請願廢止嚴厲的隔離出境政策，而在廣東則出現抗議英政府及中國官方的海報及標語。面對如此抗爭，英政府除了向李鴻章施壓外，同時亦提出一套較為和緩的公共衛生措施：允許殖民政府讓居民外出及解除太平山地區的封鎖。此次鼠疫事件導致了英國政府與華人團體——東華醫院的鬥爭，其結果不僅使後者喪失對醫藥的自主權；亦使其作為一個非正式權力團體的自主性也淪陷。Benedict 認為香港居民對殖民地的公共衛生政策的抵抗與同時的印度及歐洲居民的反抗模式有明顯不同。究竟有何不同，作者未多做說明。此外，本章第二節「香港的市民活動主義與國家醫學（應改為殖民地醫學）的衝突」的內容，大抵港大亞洲研究中心研究員 Elizabeth Sinn（洗玉儀）的東華醫院專著皆已談過⁵，作者論點並無創新之處。

第六章：「中國新政時期（1901-1911）鼠疫和國家醫學的起源」。本章主要在探究一八九四至一九一一年這七年間，仕紳對國家醫學及西式公共衛生觀念的態度轉變過程。近代中國所謂「國家醫學」概念是在中日甲午戰爭後才開始出現。新政時期，改革派知識分子及部份

⁵Elizabeth Sinn, *Power and Charity: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Tung Wah Hospital, Hong Kong* (H.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官員傾向將西式的公共衛生組織從香港及其他通商口岸擴展至內地，他們開始意識到唯有建立國家醫學，才能有效地增強國力及維持民族生存。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袁世凱對滿州瀋陽的建設，他開始引進西式的公共衛生制度作為新政改革計畫的一環（檢疫制度、隔離醫院），他的動機不是出於對公共衛生的關心，而是為了防止外國勢力藉防疫問題來干預中國內政。直到一九一〇年滿州爆發「肺鼠疫」疫情，這套醫學新政才正式在中國某些地區實施，當時負責執行此項政策的是鼠疫權威—伍連德（1879-1960）⁶。滿州鼠疫和香港不同之處在於：滿州鼠疫爆發時，推動隔離措施和拘留疫者的主力是國家的醫學行政官僚（防疫總署）。此外，當時紳商（商務總會）不僅展現配合態度；同時亦建立由商會設立的隔離醫院及檢疫隊（搜尋及收容患者）。商會如此做法，一方面是為了防止政府過度干涉；一方面則又具有協助分擔檢疫工作及監督政府活動的功用。

「結論」：作者首先指出，十九世紀末中國有關鼠疫的歷史圖像不單只是生物學的現象，亦是文化的現象。換句話說，當時中國境內的傳染病問題並不單純只是醫學的問題，其中還涉及了國家權力、殖民主義、文化認同及外交競逐等問題。若將此歷史圖像置於十九世紀末西方醫學中的傳染病學（epidemiology）、微生物學（microbiology）及熱帶醫學（tropical medicine）的發展脈絡來看，這些學門在當時仍屬有待研

⁶伍連德是近代中國傑出的公共衛生專家及醫史家，祖籍廣東，生於馬來亞。1905年畢業於劍橋大學，先後就任陸軍軍醫堂副監督、東北防疫處處長、中央防疫處處長、海關檢疫總處處長等職。其對東北鼠疫的防治措施，參見馬伯英、高晞、洪中立，《中外醫學文化交流史——中外醫學跨文化傳通》（上海：文匯出版社，1993），頁439-442。 *Plague Fighter: The Autobiography of a Modern Chinese Physician* (Cambridge, Eng.: Heffer, 1959).

究的領域。因此，當時英國殖民政府加諸香港的種種公衛政策未必是一種合理及有效對應鼠疫疫情的良策；而中國居民對於自認優越的西方醫學體系的排斥及反抗亦未嘗不理性。其次，Benedict 認為一八九四年香港政府的防疫措施並非建立在鼠疫傳染病學的知識基礎上。其實，該政策形成的背後有許多因素：微生物學的出現、十九世紀的國家醫學運動、對中國社會的偏見、以及環繞著熱帶醫學說的東方研究論述。最後，作者再度重申十九世紀末中國對鼠疫問題及對西方殖民地處置態度的反應，反映出當時國家與社會間的互動關係的一環。

綜合上列所述，我們大致可歸納幾點特色：（一）本書運用相當多十九世紀末西人的鼠疫調查報告書，這些無論是傳教士或醫家的資料，一直是研究中國疾病史學者所最或缺的部份，而作者在此卻能全面蒐羅並成功地重建了當時中國鼠疫問題的全貌，貢獻良多。（二）不同以往治鼠疫問題的學者，Benedict 不僅從醫學史角度探討鼠疫的緣起及傳佈，更從社會史層面深入分析鼠疫所引發的公共衛生問題所帶來的國家／殖民地及國家／社會間的權力角逐和衝突。（三）本書主題明確，結構完整，論述嚴謹，對於近來西方醫學史研究動向掌握相當清楚，是了解近代中國醫學、疾病與社會關係不可或缺的著作。

雖然本書有以上優點，但仍有些許問題值得進一步斟酌。

（一）本書書名雖名為 *Bubonic Plagu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但內容所談卻不限腺鼠疫 (bubonic plague)，還包括第六章的東三省鼠疫主角——肺鼠疫 (pneumonic plague)，作者應在前言部份稍作解釋。（二）「國家醫學」(state medicine) 是十九世紀才在歐洲及北美逐漸發展的觀念，它的中心思想是國家有主要責任去保障公眾的健康，因此為了全民利益，國家有權利亦有義務去將衛生學的觀念及公共衛生措施加於私人身上。要了解近代中國「國家醫學」的發展，當

時一些在中國有租界地的國家（英、美、德、日）的殖民地醫學發展就不得不談，而這些殖民地醫學又與他們本國的國家醫學發展息息相關，因此三者關係呈現一幅錯綜複雜的局面。例如，香港的鼠疫防治受了英國的影響，袁世凱的北洋公共衛生部門是德、日模式，伍連德於一九一二年成立的「北滿州鼠疫防疫署」則深受德國影響，而二十世紀初期作為日本殖民地的臺灣的公共衛生發展亦可說是日本母國「新醫學」的移植。究竟這些西方醫學如何影響近代中國公共衛生政策的發展？本書著墨不多，最後兩章討論國家醫學與殖民的醫學部份僅佔本書正文五分之一（34 頁）篇幅，許多問題點到為止，未能深入探討，稍嫌遺憾。近來一些國家／殖民主義與醫學的研究成果頗值得我們借鏡，例如美國學者 William Johnston 及日本學者福田真人都於一九九五年不約而同出版近代日本結核病史的專著，這兩本著作都有相當大篇幅涉及國家醫學與疾病的課題⁷。（三）作者認為國家權力的強力介入公共衛生事務似乎是對付傳染病的普遍及有效方式；而將民間商會

⁷ 有關日本近代結核病與國家醫學的發展，參見 William Johnston, *The Modern Epidemic: A History of Tuberculosis in Japan*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95)；福田真人，《結核の文化史》（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會，1995）。有關英國國家醫學的發展，參見 John M. Eyler, *Sir Arthur Newsholme and State Medicine, 1885-1935*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有關德國國家醫學的發展，見 Arleen Tuchman, *Science, Medicine, and the state in Germany: The Case of Baden, 1815-1871*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有關東亞地區醫學與殖民主義發展，參見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中國經濟研究室主辦、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協辦，「醫學、殖民主義與社會變遷研討會」（台北：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1988.5.20-21）。有關十九世紀中國與西方醫學關係，參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主辦，「中國十九世紀醫學研討會」（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8.5.22）。

自設隔離醫院所造成的高死亡率視為是政府放任的結果。如此強烈對照後，作者進而強調由國家所推動的公共衛生是件有益且必要的工作，這樣的政策將人民史無前例地置於國家的控制下。如此立場似乎有失偏頗，究竟國家透過國家權力從上至下對人民身體的干涉及控制是否那麼有效且絕對必要，仍有待進一步探討 (p. 163-164)。(四) 有關十九世紀末鼠疫病原學 (etiology) 中的細菌理論 (germ theory) 是如何為香港殖民政府接受？鼠疫桿菌發現前後香港政府的前後處置態度如何？這些問題作者並未明確交代。近來 Mary P. Sutphen 曾在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就此問題和同是英屬地的加爾各達 (Calcutta) 做詳細的比較及探討，她認為「鼠疫桿菌」(bacilli) 的說法很快就被香港政府及當地菁英所接受，他們所爭議的不是「何謂鼠疫桿菌？」；而是能在何處發現它們的蹤跡，以及如何預防及控制疾病的爆發。她分析細菌理論之所以會如此順利被接受，一是因為當時醫界人士、殖民官員及當地菁英習慣將細菌理論套用在先前的理論架構 (瘴氣說) 上，因此仍在導致昔日其它疫病原因的場所找尋病原；其次，殖民官員接受新的細菌理論並不需要改變既有控制疾病的例行做法⁸。換句話說，法國科學家 Alexandre Yersin (1836-1943) 及日本微生物學家北里柴三郎的新醫學發現並未對殖民政府的防疫措施有任何的重大改變。(五) 有關二十世紀初廣東地區的防疫措施及奉天萬國鼠疫研究會始末，作者遺漏了史學家陳垣 (援庵) 早年 (1907-1913) 於《醫學衛生報》、《光華醫事衛生雜誌》所寫的「醫事批評」及「醫事雜評」等重要資料⁹；此外，作者亦忽略掉《申報》中許多當時香港鼠

⁸ Mary P. Sutphen, "Not What, but Where: Bubonic Plague and the Reception of Germ Theories in Hong Kong and Calcutta, 1894-1897," i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52 (January 1997): 81-113.

⁹ 陳垣，《陳垣早年文集》(台北：中研院文哲所，1992)。

疫的一手新聞報導。

此外，有些手民之誤，例如：「範行準」應為范行準 (p.233)，「謝肇制」應為謝肇淛 (p.235)，「鄭肖岩」應為鄭肖巖 (p.235)。

儘管有這上述問題，但瑕不掩瑜，本書仍是欲了解近代中國鼠疫的傳佈模式與國家／殖民醫學關係的重要著作。近來這方面的研究漸受學界重視，先後已有 Bridie Jane Andrews、Larissa Heinrich、張哲嘉、雷祥麟及李尚仁等年輕學者投身近代中國醫學史的研究¹⁰。儘管研究取向各有特色，但共通處在於這些研究者皆受過西方的醫學史或科學史訓練，因此較能充分掌握西方近代醫學史研究的最新動向。Benedict 的腺鼠疫研究已經隱約展露出這種特色，但仍屬起步階段，目前此領域仍有許多議題等待學界去開發，例如十九世紀教會醫學如何影響中國醫學發展？西方醫學經典引介至中國後的病名中譯及解釋，近代中西醫交流，以及近代國家醫學的發展等問題，這些或許是

¹⁰ Bridie J. Andrews,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ese Medicine, 1895-1937," Ph.D. Diss.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1996. Larissa Heinrich (韓依薇, 柏克萊加州大學博士候選人), "Curing Chinese Culture: Lam Gua's Medical Portraiture," 發表於「中國十九世紀醫學研討會」; Che-chia Chang (張哲嘉,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 "The Therapeutic Tug of War: The Imperial Physician-patient Relationship in the Era of Empress Dowager Cixi (1874-1908)," Ph.D. Diss.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1998; Hsiang-lin Lei (雷祥麟, 芝加哥大學博士候選人), "From *Changshan* to a New Antimalarial Drug: Re-networking Chinese Drugs and Excluding Chinese Doctors," 發表於「醫療與中國社會」學術研討會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1997.6.26-28); Shang-jen Li (李尚仁, 倫敦大學醫學史博士候選人), "British Imperial Medicine in Late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and the Early Career of Patrick Manson," MSc Diss. 1995; 以及他在「中國十九世紀醫學研討會」發表的〈想像的熱帶——十九世紀英國醫學論中國風土與中國人體質〉

日後學界可以繼續思索的研究方向。